

## 引 言

齐鲁旧邦，文风泱泱。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的山东大地，从来就是一方文采风流世代传习的宝地，人才辈出，佳作联袂，影响泽被四方，哲理诏告百世。近代以降，虽屡遭战乱，又兼地土贫瘠，以致兵联祸结，民穷财尽，文化事业颇近萎缩；但仍不乏健者，奔走呼号，有的投身共产主义的宣传、组织，关注革命事业的进展，如王尽美，有的致力人文精神的介绍、阐发，推进新文学事业的进程，如王统照……都在近百年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业绩，成为山东人民的骄傲，齐鲁新文化的光辉代表。

王统照出生于文化教育素称发达的山东省诸城市相州镇的书香门第，自幼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兼天资聪颖，勤奋诵读，长于思考和练习，对以齐鲁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明，感受深切，学养丰厚，是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最合适的传承人物。少年至青年时代，他在省城济南和古都北京就读，亲身经历了从“辛亥”前后到“五四”前后的巨大历史变革，从欧风美雨中积极地吸纳了有益的营养，为齐鲁文化的现代演化，为中西文化的交汇融合，开掘了最畅通无阻的渠道。无论从主体条件还是客观情势来看，他无疑都是齐鲁文化优秀的现代传人。

1919年，王统照作为中国大学的学生，走上天安门广场，参加了五四之日的集会游行，是山东人中参加五四政治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运动的第一人。他又是中国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是该会在北

京地区的实际主持人。他的小说、散文、新诗、翻译、文学批评等，以独具的风采和个性，大大丰富、充实了五四新文学的实绩，壮大了五四新文学的声威，是继鲁迅等先驱、大师之后而与叶圣陶、谢冰心、朱自清、许地山等同辈的当之无愧的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代作家。他大力倡导现实主义，但又不拘泥于一种创作方法与艺术精神，而是以开放的姿态与宽容的精神，广泛吸纳世界文艺思潮，兼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乃至现代主义，既以风格的多样性引人注目，更以贡献的多样性奠定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2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事业的与感情的、社会的与家庭的种种原因，他从新文学的中心北京急流勇退，孤独地定居青岛，度过了落寞、忧伤的几度岁月。对外的联系稀少了，创作的产量减少了，但内心的痛苦和忆念，却在长期的思考、酿化中结晶为几篇精美的文字，在他几十年的文学生涯中，占据着今天看来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在自我寂寞痛苦的岁月里，他不忘热情地培育文学的新芽，一面主持了青岛第一家新文学期刊《青潮》的创刊，掀开了青岛乃至山东新文学运动的第一页，一面自觉地充当了臧克家、吴伯箫、王亚平、于黑丁等大有希望的青年人的文学领路人，为新文学培育了一批活跃在三四十年代的作家、诗人。

1931年的东北之行，是他冲破封闭走向新的文学创作高潮的重要契机。他在东北，目睹了强寇侵陵、国土沦丧、当局昏聩腐败、民众浑浑噩噩的现实，激发出难以抑制的爱国情感，孕育了他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山雨》以及一批与此主题相关的小说、散文，为30年代中国文坛，增添了一分以呼吁反帝救亡、正视国难现实为题材的重大收获。由于较长时期生活于山东的城乡，他的家族的生计又密切地联系着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北方农村的经济状况与北方农民的心

理状况，一直是他潜心观察、深入思考的中心，更是他魂牵梦系、郁结内心的一种情结。这种考察、这种情结，1933年艺术地外化为《山雨》，成为30年代描绘北方农村画卷、北方农民心态的史诗性巨著，与茅盾的《子夜》一起，分别从都市和乡村两个主要侧面，共同支撑起反映中国最切近的现实的小说天地。

由于《山雨》以那样广阔的画面、那样生动的笔触描绘出30年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急存亡的情势，对国人是一种警示，对当局自然是一种威胁，于是他有了载入“黑名单”的“光荣”。这迫使他匆忙出走，避祸欧洲。1934年一年之内，他横海欧游，历经八国，一面对欧陆风情与西方文明有了比较深切的感受，另一面更滋生出对吾国吾民的炽热情感，促使他以更忘我的姿态，投身以上海为中心的文学活动。他在这里主编当时国内大型的纯文学期刊《文学》，形成30年代中国的又一文学中心。他主持的《文学》月刊，兼顾创作与翻译，重视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是老作家推出力作的重要阵地，更是文学青年发表崭露头角的处女作的园圃。他在这里写下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形成他的又一个创作的高潮。他在这里亲历了“八一三”的耻辱和恐怖，于是当国难来临的时候，临危不惧，处乱不惊，而是以惊人的坚韧的精神力量，从抗战前到沦陷后，从奔走呼号呼唤国魂，到隐姓埋名誓不与敌伪共戴一天，不屈、不移、不淫，挺立两间，在新的情势下谱写了又一曲中华民族的正气歌。即使在最艰危的岁月里，他也从来没有丝毫放弃过自己作为一个华夏子民的责任，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的责任。历史就是这样写下来的：他是中华民族的忠诚的儿子！

抗战胜利前夕，他回到青岛，本拟在这里收拾残局，为新文学开辟一块新的园地。没想到翘盼了整整八年的“胜

利”，竟是那样令人心寒！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很快地把他推向与爱国学生、民主运动同步前进的时代潮流。在这里，他编辑过几种副刊，但不幸一一短命；他在山东大学任教，又因支持学生而遭解聘；他的知心的朋友如郑振铎、叶圣陶，又远在他乡；他的思想感情，已经没有可以畅所欲言自由发抒的阵地……于是，痛苦和愤激，便以更加深厚浓重的形态，袭击和征服了这位具有沉郁而婉曲的个性的老作家。偶尔发表的几篇文章，处处透露出旧时代临近灭亡时的贫困、战乱与死亡的总主题。

幸而解放大军及时地进驻青岛，把已经苦闷到极点的作家一举解救出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王统照的布满乌云的心，于是被和风丽日装点得空前美好，他的作品的基调，也顿时变得明朗开阔起来。他以多病之身，忘我地投入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开创与建设，特别是山东、青岛的革命文艺事业的奠基。从图书馆到影剧院，到现代吕剧到《聊斋》版本，他都有关注的兴致，因为这是人民、人民的政府交给的事业。重任在肩，他只好放下手中写惯了小说、散文的笔，写工作报告，写发言稿，参加各种会议和汇演。本来就多病的身体，在繁重的不熟悉的工作中日益衰弱起来。50年代中期，已经是病势沉沉，整个冬天都是拥炉而坐足不出户，但还是抱病写下关于文艺理论的一组短文，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书桌上摊开的，还是开篇不久的以胶东近代历史沿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胶州湾》的手稿，在他病得喘气都极其困难的时候，还在心心念念为山东省图书馆购置图书……，事事处处，都在证明着他的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国的、山东的文化、文学事业！……

但显然，对他的研究，与他对中国新文学、山东新文学的贡献，是颇不相称的。我们还没有一部像样的理论专著，

系统论述他的文学事业的得失，还没有一种文学史，以令人信服的表述，梳理他的文学历程与心灵历程，还没有一种兼通中外的著作，详尽地描述他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和区别，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他在新文学文体建构中的作用和意义，他的文学语言的优长和不足，他的文学理论与文艺批评的特点与建树……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对王统照的研究，我们所有的，仅仅是一种基础，一种前导。而这一任务，毫无疑问是应该由山东的学者自觉承担的。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笔者不揣浅陋，发愿要写一部尽量科学的王统照研究的学术专著。至于这部书的学术含量究竟如何，观点与材料的科学性如何，正待贤明的读者公断。



上篇

人  
品  
论



## 一、文化定位

### 1. 齐鲁文化的现代承传

齐鲁文化是孕生东方文明的文化母体之一，从山东走出去的现代作家王统照，则是齐鲁文化理想的现代传人之一。

1981年9月，山东省沂源县骑子鞍山的东麓，出土了若干远古人类化石的残片，证明这里早在大约50万年以前，就已经活动着北京猿人的同胞，这就是与周口店“山顶洞人”不同系列的、被定名为“沂源人”的又一种中国猿人。这证明，山东人也是最早的中国人。

此后，考古学家还陆续从与沂源毗邻的山东沂水、日照、新泰、郯城、临沂等地先后发现了从旧石器时代到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从那些打制削磨得日益精细的石器工具中，人类从猿到人的演变轨迹，特别是从山地向平原移居的环境变化，从狩猎、采集到兼营渔猎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依稀可以辨识、推想而知。这说明，山东是中国最早的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到新石器时代，山东的文化遗址，就更为广泛。几千处有价值的文化遗址，几乎遍及山东全境，形成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这一中国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山东大汶口、莒县、诸城等地出土的陶器上的图像符号，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认

为就是图像文字，是比殷代甲骨文字还要早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字。这也就给学术界提供了山东文化是东方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的可靠证据。这一时期的山东人，被称为东夷人；这一时期的山东文化，也被称为东夷文化。《说文解字》指出：“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可见，最晚从汉代起，山东人体魄高大，能使强弓硬弩而善射，就已经是公认的特征了。

华夏民族正式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山东地区就日益成为华夏文化的中心地带之一。周武王灭商以后不久病故，其子成王即位，周公旦辅之，封周公长子伯禽为鲁侯，都曲阜；封太公吕尚（姜子牙）为齐侯，都营丘（今山东临淄）：由此，齐、鲁两国正式建制，也便成为山东的代称。齐鲁文化，也便是齐文化与鲁文化互补整合后的综称。

古人心目中的“齐”，即肚脐之脐，是他们意识中人体的最重要的部位之一。上古的齐人，以自己所居住的地带为天下中心，故称为齐。齐国最早的领袖，是在《封神演义》中大显身手的姜太公吕尚。他封侯以后，一面以武力征服了当地部族的反抗，一面在文化上“因其俗，简其礼”，宽容地容纳了当地的土著文化。在经济上他重视通商，便利渔盐，农、工、商并重以富民强国；在政治上尊贤尚功，礼贤下士，为一大批出身寒微的有识之士开通了走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治国济世的道路。此后的管仲和晏婴，都非贵族出身，但却都是优秀的安邦定国的股肱大臣。姜太公以兼容和务实、宽容和礼贤为治国方略，既奠定了齐国八百年的基业，又突出了齐文化的主要特征，在促使山东文化早熟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在太公治齐路线的基础上，对内富民强国，对外尊王攘夷，以频繁的会盟促进了齐地区域文化的交流。他的“九合诸侯”的事

业，他对中华大一统的倡导和维护，为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开先河发先声，促进了齐文化的成熟。著名的贤相晏婴相齐时期，齐文化又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他倡导“以礼治国”。所谓“礼”，即《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所谓“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这与孔子所大声疾呼的“礼”，在精神上已有许多共通之处，显示出齐、鲁文化汇流的趋向。他吸收了周鲁文化中的重民观念，继承了管仲的“民为邦本”的思想，从理论到实践都十分注重保民与爱民，从而给齐文化带来了新的生机，新的内涵。战国时期，从齐威王到齐宣王，在稷下即齐国都城临淄西门南首的稷门开辟学宫，招揽文学游说之士数千人，在此讲学与议论，形成非常显赫的文化中心。淳于髡、邹衍、田骈、接子、慎到、宋趺、尹文、环渊、田巴、鲁仲连、荀况等一大批文学家、政治家、义士、哲人，都曾在这里著书立说，讲学授徒，或议论朝政，臧否天下，成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契机，被历史学家称为“稷下学宫”。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指出：“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划时代的意义。”学界则认为，稷下学宫的创辟，为多种学术思想提供了讲学著述和论辩交锋的适宜的场所以及氛围，代表不同类型与不同区域文化的学说体系、观念形态，在这里交流、融合，互相影响，推动战国时代学术思想上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所以，这既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标志，推动着当时政治的走向昌明，又空前地提高了中国文人的独立观念和人格意识，促进了素朴的民主氛围的形成和发展。那种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正是孕育开放型的文化形态的精神圣殿。从太公封齐到秦始皇一统六国，在八百余年的历史沿革中，齐文化逐步形成了以务实、变革和开放为主要精神特征的区域

文化体系，对此后的齐鲁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都有深远的影响。

鲁文化的中心和基地在曲阜。伯禽作为周公的长子、鲁国的开国君侯，比较完整地继承了周公旦在周初所创造的一整套礼乐文化。尊礼，是宗周文化的主干，也是鲁文化的最鲜明特色。这一面是伯禽自觉地承袭了周公旦制礼作乐的文化传统，对土著文化采取了“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的方针，一面是鲁国农业与手工业相对发达而商业相对落后的经济形态，使鲁人安土重迁而易于接受礼的教化。所以当西周衰微、中原各国纷纷礼崩乐坏之时，受宗周文化熏陶最深的鲁国，便乘时利变，脱颖而出，成为宗周文化的正宗，华夏东方的礼仪之邦，“周礼尽在鲁矣”之说，也就信然非虚。待孔子出，以鲁文化为基地的儒学，便顺天应人，蔚为大观起来。孔子创造了一个以“仁”为中心的知识道德一体化的思想体系，更以“仁”解“礼”，把“礼”的外在社会性指令发展为人的个体性内在需求，同时强调“仁”和“礼”都应贯彻到日常生活和伦理感情之中，既有强烈的现实感和实践性，又具有超越世俗层面的终极关怀价值。正如杜维明在《儒学传统的现代转化》中所说：“儒学的精神方向，是以人为主的，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和西方那种反自然、反神学的人文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孔子的儒学，后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及后世的显学，一面因为它确实是中国高雅文化的学术代表，一面则因为它在不断变化中已经逐步内化为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其影响是至为深远的。在孔子仁、礼思想的基础上，孟子又发展为“仁政王道”的理想。他主张人性本善，也强调后天学习，即通过人格的自我修养，道德的自我完善，充分发扬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

让之心、是非之心，担当起仁、义、礼、智“四德”。他高度赞扬“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精神，高度重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这就进一步突出了知识分子的个体人格价值、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并使之内化为自觉的主动的承担。以孔孟为杰出代表的儒家文化，不仅是鲁文化的主干，而且是当时最高品位的区域文化，它的不断四溢渗透、扩大影响，实在是理有固然，势所必至。

随着中国政权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各种地域文化也日益趋向于整合。没有山水阻隔却有着大致相同生活、生产条件及相近文化传统的齐文化与鲁文化，首先在政治、经济、法律、外交等层面，由对话、交流而汇合、整一，形成与荆楚文化、中原文化等有别的齐鲁文化。齐鲁文化的核心，便是执著地追求“道”的古典人文精神，“无恒产而有恒心”的理想追求，“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韧性精神，“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义，有杀身以成仁”的牺牲精神，与悯农重农的经济观念，内外交织，为历代中国知识者的文化思想建构，提供了理想的精神范型，培养了孔孟之外一大批杰出的知识者，孙臧、晏婴、邹衍、扁鹊、尹文子、田胙、公输般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汉武以降，独尊儒术，齐鲁文化逐渐脱离原初的区域文化形态，迅速占据了大一统的民族文化的主体部位。儒家学说的神圣化，儒家观念的行政化，儒家伦理观念的社会化，使儒家文化成为封建政治的可靠同盟，成为封建等级制度和禁欲主义的思想依据，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也就成为封建意识形态的人格化符号。齐鲁文化最宝贵的人道精神、民主遗风、重农观念，在这种异化中被粗暴地扭曲了；但在文艺领域中，却一直开放着不败的花朵。

魏晋时代是人的觉醒与文明的觉醒的重要时期。“建安七子”中的孔融、王粲、徐干、刘祜都出自山东，文采风骨，颇得曹丕的高度赞扬。稍后的左思，以赋名世，“洛阳纸贵”的传说，显示了他在当时文坛的重要地位。鲍照、颜延之以诗著称，与著名诗人谢灵运被合称为“元嘉三大家”。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则在这时期建构起中国最早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体系。两宋时代是齐鲁文学最值得骄傲的时期，李清照（号易安）与辛弃疾（号幼安）恰巧都是济南人，济南二安又恰好代表了“婉约”与“豪放”两大流派及其最高成就，把宋词这种文学样式推向了成熟。他如北宋初年的王禹称，“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都为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散曲在元代最称发达，其中便有山东作家张养浩的贡献。武汉臣、岳伯川、高文秀、张寿卿、康进之等，则是元杂剧作者群中的佼佼者。李攀龙、谢榛、冯惟敏、李开先等，有的名列前后七子，有的致力戏曲创作，各有建树。诗人兼评论家的王渔洋，杰出的小说家蒲松龄，优秀的戏剧家孔尚任，都是既领一代风骚又影响久远的文坛大家。

总之，他们秉承齐鲁文化重视人格建设、关心国是民瘼的传统，在自己的作品中糅进了时代的精神，在不同的背景下创造出色彩各异、体式不同的艺术精品，既是齐鲁文化开放的绚丽花朵，又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承续和发展。正是在这样灿烂、丰厚的文化背景上，王统照出现在中国文化由传统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品格转型的时期，一面身负传统而又走向现代，一面投身现代而又返顾既往，典型地体现着“五四”一代文化人的心态，也典型地体现着齐鲁文化在现代的延展与嬗变。

如前所述，齐鲁文化是一个极其庞大、复杂的思想与情

感的体系，又有着原初形态与异化形态的巨大差异。王统照作为齐鲁文化的现代传人，其思想、意识、情感、心理诸多层面，就必然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多样的侧面与变动的格局，任何简单化的处理，都有可能损害尊重历史、尊重作家人格的写作初衷。但受限于笔者的水平和本书文本形态的独特要求，只能就大处落笔，条分缕析，以论证为主；那些鲜活的细节，以及人格的血肉，往往无法具象地呈现。好在笔者另有《王统照传》一卷，可以与此书互相补充，有心的读者自当会加以参照并提出批评的。为此，笔者当先致谢。另外，本章撰写中，参考了魏建、贾振勇的著作《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特此致谢。

开放意识。异化后的齐鲁文化常常以封闭而屡遭指责，这的确是其致命的缺陷之一；但原初的齐鲁文化，又分明具有开放的鲜明特征，而且，开放也是齐鲁文化能够在诸多区域文化的竞争、汇流中从一枝独秀到独领风骚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因之一。换言之，没有开放意识，也就没有齐鲁文化后来的主流地位和独特命运。王统照从幼年起，就系统地诵读儒家的典籍，对原初儒家的论述烂熟于心。而当他接受这种文化的熏陶时，从纵向上看，他就学于以八股取士的制度已经土崩瓦解的新旧交替时代，从横向上看，他处在疏离了儒家学说政治化和儒家理念伦理化的中心地带（如北京、曲阜）的边缘地区，因之，他所接受的儒家观点，相对而言，就较少受到一班腐儒的曲解的影响，而有可能比较接近原初儒家的本来面目。破除封闭意识，建树开放意识，便是王统照从原初儒家思想中汲取的源头活水之一。

开放意识，首先就是自觉地走出封闭，积极地接纳世界文化、思想潮流，在与世界文学、文化的广泛联系中建立新

的精神结构与文化范式。“五四”一代学人、作家，大都是在与世界文学、文化的联系中显示出与传统文人迥然不同的精神风貌的，这是历史转型期的重要特征，更是文化变异的时代标志。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王统照是在 1919 年发表他的第一篇介绍国外文学的文章的。在他居留北京时期，即从 1917 年到 1926 年，先后介绍过俄国、英国、法国、德国、爱尔兰、印度等东、西方国家的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或文学思想。他特别关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叶芝及不久以后访问中国的泰戈尔，发表过长篇的研究论文，与早在 1906 年就开始介绍西方“摩罗诗人”的鲁迅等先驱相比，他还算不上介绍域外文化的第一批现代作家，但也是起步甚早者之一；同时，他又有关注面比较宽泛的长处，因为刚刚从封闭中走出的中国文化—文学，实在太需要从多侧面多渠道吸纳各种各样的精神营养，实在太需要从各国家各民族的说、思潮中寻找自己合用的思想武器。王统照的优长与局限，就在于起步早，视阈广，可惜未能长期坚持，未能逐步深入，以至在这一领域里往往被人遗忘。

开放意识，更体现在自觉地借鉴西方的文学观念重铸自己的文学理想，改造自己的文学体式以适应时代的需求。王统照在“五四”初起时，就以先知先觉的姿态，一面紧跟鲁迅、胡适、叶圣陶等之后大量创作白话短篇小说及白话新诗，以诗集《童心》和小说集《春雨之夜》，为刚刚亭亭玉立的五四新文学的生命之树增添了几许鲜活的枝叶；一面在其他新的文学体式的实验中显示出自己的旺盛创造能力——他是中国第一批白话长篇小说的作者（其长篇《一叶》与张资平的《冲击期化石》同为中国现代最早的长篇作品）又是白话美文的倡导者及实践者之一，还是“五四”初期自觉地提倡文学批评特别是诗歌批评并且多有理论建树的文学家

之一。他的小说，也从不拘泥成法或自己画地为牢，而是广采博习，融写实的、抒情的与哲理的于一炉，首创出一种堪称开放式的创作方法，在“五四”前后乃至中国新文学史上，都能独树一帜。这种文学体式的大胆试验及试验成功，大多由于他对西方文学样式及文学理论的熟悉，换言之，也就是得益于他的冲出封闭、走向开放的思想模式与文学观念。

开放的交友方式，是王统照开放意识的另一重要侧翼。他是文学研究会的12名发起人之一，对于这一影响巨大的社团，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与该社团的一些主要成员如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郭绍虞、耿济之等，一直友情浓洽，世所赞誉，对于瞿菊农等在婚姻爱情中颇多不幸者，他特别怀有感同身受的深挚的理解和同情（见王统照《民国十年日记》）。对于鲁迅、周作人兄弟这样的文坛先驱和青年领袖，他怀持敬仰和尊崇的心情，一有机会就表示自己发自内心的敬重。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的诗人作家，大都是有着欧美文化背景的欧化绅士，论理与文学研究会系统的王统照似乎难能融洽相处，但王统照却是在他们生前一直保持友好关系，在他们作古以后才撰写深情的长文抒写自己的怀念与敬仰，推重他们的人品与文学成就。在青岛，他是臧克家、于黑丁、臧云远、王亚平、吴伯箫等文学青年的启蒙导师，是他们在漫漫长夜里寻求文学机遇的忘年的朋友。在上海，他又与巴金、陆蠡、李健吾、吴朗西、端木蕻良等结成密友，有的甚至堪称生死以之的刎颈之交。他还有一批并非文坛人物的朋友，其中有医生，有银行职员，有中小学教师，有农村的小文化人，有奶妈，有城市贫民等等。当他在“孤岛”时期因为隐姓埋名生活无着时，就是依靠两位在银行做事的朋友的几度慷慨资助，才免于冻饿之